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秋收起义

板章 编写

新华出版社

263.2

K263.2

8

2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秋收起义

板章 编写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秋收起义

板章 编写

目 录

一、工农必须有武装·····	(1)
二、两次省委会议·····	(6)
三、暴动前的部署·····	(12)
四、霹雳一声震乾坤·····	(19)
五、“不能打长沙”·····	(27)
六、队伍向何处去? ·····	(32)
七、三湾改编·····	(38)



B

801229

一、工农必须有武装

1927年，正当北伐军打到长江和黄河流域，大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在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策动、收买、支持下，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正在同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突然遭到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动派的袭击。枪声仍然在响，但子弹不是射向北洋军阀，而是打入共产党人的胸膛。革命人民的鲜血仍然在淌，但不是洒在北伐的战场上，而是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党的优秀领导人张太雷、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向警予、陈乔年、肖楚女、熊雄、夏明翰、郭亮、陈佑魁等同志，为革命英勇牺牲，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在奉系军阀的绞架下英勇就义。5万多名党员只剩下1万人左右，党的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会、农会几乎被全部摧毁，其它革命群众的团体也被捣毁或查封。工农群众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政治经济权利丧失殆尽，不得不承受着比旧军阀统治时期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整个中国被恐怖、独裁、黑暗笼罩着。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大革命中推行投

降主义路线，自愿地放弃了革命领导权，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在大革命失败后，又被反革命势力表面上的强大所吓倒。他们看不见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官僚的矛盾并未解决，看不见由于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的总代表从而使这种矛盾加深和激化，看不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未完成。相反，他们认为蒋介石上台以后，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从此中国便进入了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和平发展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无产阶级只能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观点表明，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已经堕落为不要一切革命手段的取消主义者。

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堕落，迫切需要党中央在指导路线、工作方针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更新。因此，继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邓中夏、苏兆征、任弼时、陈乔年、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以及青年团中央和地方党委代表，共2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检查党中央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制定新的路线；确定今后工作方针；改组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号召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但这些

主张遭到陈独秀的压制。谁是谁非，大革命失败的现实已经作出了回答。因此，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就显得更加具有说服力。他指出，为了取得革命胜利，我们当然要和其它的革命力量一起，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的主体，只能是我党领导下的工农大众。陈独秀正是在这点上犯了错误。首先，他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了领导权；其次，他对统一战线中的主体农民的革命行动持反对态度。毛泽东还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他列举了孙中山注重军事，蒋介石靠枪杆子上台的事实；说明军队与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而党的领导人不抓军队，不要武装斗争，给我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经过一天紧张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瞿秋白代表中央提出的《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在指导思想方面，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了它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在组织上，改组了党的领导机关，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还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提出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组织秋收起义。会议为秋收起义确定了战略，这就是：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实行暴动，夺取乡村政权，在可能时应夺取县政权，发动广

大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向反革命势力进攻；实行抗租抗税，肃清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没收其财产；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在秋收起义的具体领导安排上，党中央委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负责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党的湖南省委，领导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

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秋收起义战略，以及在起义的时间、地点、领导人的选择上都是正确的。

瞿秋白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这种认识是符合当时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的。秋收起义提出的战略中心，就是武装农民，夺取政权，解决土地问题。这个战略表明党对土地革命在民主革命中地位的正确认识。

起义选择在秋收时节进行，是因为起义的大部分参加者是农民，而秋收季节，历来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冲突最尖锐，最激烈的时刻。乡村中的贫苦农民，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靠租佃和借贷过活。他们春日耕种，夏日锄耘，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自己的血汗肥沃了土地，终于换来了秋季的稻黄菽香。丰收给他们一年的辛勤带来了几分快慰和美妙的梦幻。但是，还没容农民自己从梦幻中醒来，他们的吃几顿饱饭，添几件新衣的美梦就被地主的管家、衙门的差役所打破。催租、逼捐、讨帐的喧嚣，把他们拖回无情的现实中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地主们的粮仓满了，官老爷的腰包鼓了，而自己却象以前一样一贫如洗。农民们怎么会

不恨！怎么会不怒！如果在这时提出抗租抗税的口号，发动农民起来向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进攻，无疑是最适合的时机。

起义选择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发动，是由于这四省在当时是受革命影响最深，革命的主观力量最强的地区。早在大革命以前，江西安源和水口两个矿山就开展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东征和北伐过程中，这里的农民特别是东江的农民，以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配合了革命军的行动。1926年到1927年，毛泽东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领导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优秀骨干。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鼓舞下，这四省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更是有如火如茶。到1927年，这四个省都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加入农协的会员，在湖南有451万，湖北有250多万，广东有70万，江西有38万多。四个省共有会员800多万人，占全国的农会会员总数915万多人的90%。正因为如此，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遭到反革命势力的严重摧残。尽管如此，这里革命的群众基础还是比其它各省深厚，许多人手中还保存着武器，组织暴动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又会增加这里群众的反抗情绪，在这里发动起义，显然是个有利的地区。

起义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选择毛泽东，是因为他十分熟悉中国农村状况，热情支持和肯定农民的革命运动。早在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就着手调查研究农村状况。1926年3月，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大革命高潮中，

又在湖南湘潭、湘乡、醴陵、衡山、长沙五个县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热情地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认为农民是“革命先锋”。不但如此，毛泽东历来认为建立人民武装的必要性。他认为农民不但应将地主的武装缴过来，而且应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标。大革命失败后，他更进一步强调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在“八七会议”上，他提出组织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具有领导和组织秋收起义的能力，派他去湘赣边界，必定能使中央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得到很好的执行和贯彻。

“八七会议”一结束，新中央的特派员毛泽东，立即离开汉口，肩负着党中央委托的重任来到湖南。土地革命的帷幕就从这里拉开。

二、两次省委会议

湖南长沙市的郊外，有一所很大的房屋，当地的人都称它为沈家大屋。

1927年8月18日这一天，一些人向这里走来，他们或结伴而行，或独自潜行，都陆陆续续地走进沈家大屋。他们的装束没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步履匆匆但并不慌乱，面色从容又透着几分庄重。他们是谁？到沈家大屋是串亲，访友，还

是聚会？由于一切进行的那样平常，没有人注意也不可能弄清他们到沈家大屋的真正目的。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能体会到沈家大屋发生的一切的份量。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经过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他们来到沈家大屋，是要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

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参加了会议。按照会议议程，首先选举了省委常委。接着，委员们就发动秋收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起义中要不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有的委员认为，秋收起义的主体是农民群众，起义的目的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只要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起义即可成功。至于军事力量的有无，是无关紧要的。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着重指出两点，第一，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军事力量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要失败。第二，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没有兵力的护卫就去夺权，这是自欺欺人。我们党过去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当以主要的精力注意军事问题。毛泽东的这番话，极其明确和透彻地分析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指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政权问题，都离不开革命武装。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党应当用主要力量领导军事运动。同时又阐明了武装斗争应当和农民运动相结合，以革命武装来

发展农民暴动。

毛泽东讲完这番话以后，一个委员就另外一个问题发言：“秋收起义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的土地从哪里获得呢？只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但是，请大家注意，地主阶级的情况是有很大区别的。有占有土地数量不多的小地主，有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我们应当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说到这里，他环视一下四周，发现有的人向自己投来带有疑问的目光，感到很有必要继续阐述清楚，“在中国，小地主占地主阶级的大多数。如果把小地主的土地连同大地主的土地一起没收，那么，就等于把众多的小地主推到大地主一方，推到反革命一方。这样，岂不壮大了反革命力量而使革命力量缩小了吗？”几位委员微笑着点头，似乎在表示赞同，又似乎在表示已经听懂了他的意思。

“不对！”另一个委员激烈地反驳道，语气里带有十二分的坚定，“我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不能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现在，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土地国有的时期。我们不但应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应该没收小地主的土地，没收自耕农的土地，实行土地国有！”说完，他把手一挥，然后往怀里一揽，好象要把所有的土地揽过来实行国有。

对于这两种意见，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一时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几个委员把目光转向坐在一边的中央特派员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毛泽东操着浓重的乡音，不慌不忙地提出了没收整个地主阶级土地的正确主张。他指出，中国

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要取得全体农民的拥护，就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缺少土地的农民。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我们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由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执行。对于被没收了土地的地主分子，须有适当安置，给以生活出路。同时还要废除反动政府对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由革命政权征收适量的农业税。毛泽东的讲话，基本精神就是消灭地主阶级，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充分满足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同时给地主个人以生活出路。这就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秋收起义，作了重要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次会议上，争论得最激烈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关于起义的区域问题。大多数人主张根据当时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发动全省范围的秋收起义。他们提出将全省划为湘中、湘南、湘西、和湘西南四个地区，分别以长沙、衡阳、常德、宝庆等处为中心，同时组织暴动。毛泽东认为举行这种规模的起义，主观和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在革命力量方面，人力财力都很有限，在全省范围内暴动，势必造成革命力量的过于分散。认为暴动可以在全省举行，这是一种过低地估计敌人力量的盲动思想。他坚决反对全省同时起义，极力主张缩小范围，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地区发动起义。尽管毛泽东的意见属于少数，但他的精辟分析，坚决的态度，使得多数意见也不能将其否定，因此省委决定对此问题再进一步深入讨论，以达到一致。

沈家大屋会议，有两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一

个是秋收起义中的政权问题。大家认为，目前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土地革命，因此在起义中建立的政权性质应当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在起义力量较大的地方，应立即建立工农民主政府。从前党的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已经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就连吴佩孚、赵恒惕这样的军阀也利用“民选”的口号招摇撞骗。所以我党应当抛弃这个口号，使用工农民主政府这个概念。另一个意见比较统一的问题是用什么名义号召组织农民群众进行秋收起义。党中央决定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秋收起义，对此，会议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自武汉政府叛变后，国民党已经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变成了军阀党，名声已经很臭了。因此，不但不能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起义，而且应当和国民党彻底划清界线，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至于国民党内的左派分子，只要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坚强，他们是会跟我们走革命道路的。

8月30日，省委常委又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事前对起义区域问题进行过反复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终于认识到要在全省同时起义，人力财力都有困难，而且也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缩小起义区域、集中革命力量的正确主张，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地的地区组织起义。这个地区处于湖南省东部，东接江西，北界湖北，一旦发动起义，其影响可波及到湘、鄂、赣三省。当时的情况是，湖南新军阀唐生智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位，将部队的大半调往湖北、安徽一带与蒋介石、李宗仁对峙，留在湖南的部队又

多调往湘南防范勾结广东军阀的许克祥部，湘东敌人兵力空虚。而在这个地区，还保存着一批由我党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可以作为起义的军事骨干，而且毛泽东曾经多次亲临湘东和安源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发动工农运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敌我力量对比上，不象在其它地区那样强弱悬殊很大。很显然，在这个地域进行秋收起义是很有利的。

省委还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宣传问题，提出了10条暴动口号：

- 1、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
- 2、暴动打倒省政府
- 3、暴动打倒国民政府
- 4、暴动杀土豪劣绅
- 5、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 6、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
- 7、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
- 8、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 9、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 10、暴动胜利万岁

省委要求在暴动前和暴动中做到：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杀土豪劣绅反动派；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财产；抗租抗税；平分土地；组织革命委员会。

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另

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

在有关起义的问题基本解决后，9月初，省委作出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以阻断敌人的交通运输，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毛泽东根据省委常委会议的决定，立即乘火车赶赴湘赣边界，开始了紧张的军事部署工作。

三、暴动前的部署

1927年9月初的一天，雷鸣电闪，风雨交加。在通往安源山的泥泞山道上，走来一个人。这个人三十余岁，魁梧的身材，一身蓝粗布便服，一双穿着草鞋的大脚，在崎岖的道路上迈着坚实的步伐，后面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他就是毛泽东，自从离开长沙后，先到了株洲等地，现在又奔赴安源。为了迅速赶路，他干脆收拢那把被狂风撕破的油纸伞，疾行在风雨之中。

毛泽东以前曾多次到过安源。这次又带着新的重任来到这里，部署即将举行的秋收暴动。

几天以后，在安源张家湾的一栋民房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26岁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等十多位党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向大家分析了大革命

失败后的形势，重申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观点。接着，向大家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改组的经过和秋收起义的计划，并宣布了省委关于建立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的决定。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便深入地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

当时在湘赣边界，我党掌握的参加秋收起义的军事骨干力量主要有三支：一支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支是平江、浏阳的农军，另一支是安源的工人武装。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党协助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武昌建立了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这支部队的，大多为安源工人和湘、鄂两省工农运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警卫团的团营主要领导干部多为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卢德铭是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人，生于1905年，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他在叶挺独立团曾任过连长、营长、73团参谋长等职。是我党优秀的共产党员，出色的军事干部。在北伐战争中，他表现得英勇顽强，灵活机动，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当警卫团建立的时候，叶挺想让他担任团长，但考虑到自己政治色彩太浓，如果亲自推荐，肯定会遭张发奎拒绝。于是就请张云逸向张发奎建议。张云逸是粤军老军务，为人正直朴实，在粤军中很有威望，经他提议，张发奎果然同意了。卢德铭利用团长这一合法地位，吸收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做各级干部，使警卫团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党指示警卫团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

接到党的指示后，卢德铭立即带领部队向南昌方向开进。他们带了三个营和团直属部队，由武昌乘船沿长江东下。正当这支戎马铁流东进时，侦察尖兵突然传来情报，张发奎早已在九江严密布防，准备在部队通过时将其缴械。部队随即改变进军路线，在阳新县的黄颡口登岸，然后经武宁、靖安向南昌疾进。还未到南昌，得悉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远去闽粤，于是部队决定改变计划，西趋修水，休整待命。经过武宁时，遇到了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军，于是两支队伍同赴修水。警卫团驻进修水县城后，卢德铭等团的领导干部去武汉向党中央报告工作，部队暂由第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当时修水县桃树港还有一支农民武装，他们是由鄂南通城、崇阳开来的，共100多人，领导人是罗荣桓。警卫团进驻县城后，知道这个消息，即派人同罗荣桓联系，把他们接到修水县城，编为警卫团的特务连。

平江农军是在北伐军解放平江后，我党接收当地民团武装组建起来的。开始叫团防队，由共产党员余贲民任队长。以后这支队伍收缴了一些外来散兵的枪支，不断补充了党组织和各乡镇农会输送来的人员，队伍扩大到500人左右。1927年7月中旬，中央指示这支武装和浏阳农军合编为贺龙领导的20军独立团。他们和浏阳农军在平江长寿街会合后，开往江西南昌。8月5日到达涂家埠，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南下，前面又有张发奎军队阻挡，无法通过。于是平江农军开往修水，浏阳农军开往铜鼓。

浏阳农军是在县委书记潘心源领导下建立起来的。1927